

往事

——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

第一百一十九期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

编者的话：戚本禹先生和阎长贵先生的答问，从批《清宫秘史》谈到田家英的自杀，从王关戚事件谈到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，再谈到林彪事件，似铺陈了一段“倒刘”和“倒刘联盟”的内部关系变化的历史。

毛刘之争究竟起于何时？毛忌惮的究竟是刘的为人，还是刘占据的权位，还是刘的宗派及其所控制的官僚阶层，还是刘的“路线”？抑或兼而有之？

关于这些问题，坊间至今似还不甚明了。戚本禹先生的叙述再一次提醒我们（文革时已经提过），这场斗争的表面化其实从批判《清宫秘史》时就开始了，也就是说，贯穿于文革前的整个十七年。联系到文革前从新民主主义阶段问题，中经七千人大会，到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，毛刘的争执怨仇不断发展。可以想见，这十七年中，毛如芒在背如鲠在喉的感觉，他屡屡发难却又自食其果的难堪，他眼睁睁地看着大权旁落却又无可奈何……所有这一切郁积在心底，导致了毛最后的铤而走险，孤注一掷。

文革既发，“以刘划线”，凡是拥刘的，就是“错误路线”。如戚本禹所说，毛的秘书田家英就是因有“一仆二主”拥刘之嫌而被逼自杀的。这让人想到毛的另一个秘书陈伯达，在“以林划线”时期也被抛弃。因此，“革命路线”应该是“以毛划线”，谁反对毛谁就是“反革命”，“倒刘联盟”中人如林、陈等亦不例外。

虽如此，文革的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。其中，“倒刘”与毛的政治理念相关联，“倒刘联盟”与党史上的是非恩怨有缠绕，“群众运动”与十七年高压统治积累的社会矛盾涉因果，等等。

即以整肃对象而论，既有以往的五类分子、“反动学术权威”、文艺界的“三名三高”等，又有本次运动的重点“走资派”；既有保皇派，又有造反派；既有“二月逆流”诸君，又有文革小组要员……。整人一定要有什么重要原因吗？未必。或因他认为别人不忠，或因别人对他的方针政策有歧见，或因他对别人心存疑忌，或因某种政治需要，或因受了挑拨离间，甚或是一时的感受……都可能置人于死地。凡此，都是专制体制下“绝对权威”的必然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与其说“以毛划线”，不如说“由毛划线”。

戚本禹先生被置于死地，就是典型一例，可谓文革悲剧中之悲剧。在文革这祸乱天下十年的大悲剧里，他作为毛江夫妇爱将冲锋陷阵两年不足，作为文革祭品被他们“端”出下狱八年有余（期间，逢1975年狱犯大赦，毛特加限定“除陈伯达和王关戚外”），文革后又被判刑十八年。以“革命”始，以“反革命”终。而时至今日，戚先生还对毛江忠贞不二，对文革称许有加，以遗臣、孤臣形象示人，这又给这悲剧中的悲剧增添了几分悲情。或许，还有几分滑稽。

这篇答问再次点明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常识：不能把文革跟十七年切割开来。同理，也的确不能把前三十年跟后三十年对立起来。这六十年的光阴流转，昨是今非，不变的是纲，变的是目；不变的是本性，变的是策略；不变的是想法，

变的是说法。而已，而已。

戚本禹阎长贵说“文革”

阎长贵

2008年12月上旬、下旬，戚本禹因事来京，我和他见过几次面，谈到“文革”中的一些问题，兹择要整理如下。

一、关于《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？》文章的写作及开展大批判的一些情况

阎长贵（简称阎）：你《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？》文章的写作过程是怎样的？

戚本禹（简称戚）：搞批判，或者说搞大批判，这是主席在“文革”中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。1967年初，江青传达主席的意见：秀才们应该写些批判文章。至于写什么题目主席没说。我是搞历史的，就选择了批《清宫秘史》。王力、关锋批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，这就是他们后来以《红旗》杂志编辑部、《人民日报》编辑部名义发的那篇《〈修养〉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》。姚文元原来打算批刘少奇的文化思想，后来改写《评陶铸的两本书》。我为了写批《清宫秘史》的文章，“大闹怀仁堂”即被称作“二月逆流”的那次会都没参加。

阎：你在文章里说刘少奇讲《清宫秘史》是爱国主义，刘少奇不承认啊？

戚：他说过的，这是胡乔木报告主席的。胡一直到死都没否认这点。（按：北京电影制片厂《毛泽东文艺思想》第3期第29页有胡乔木关于电影《清宫秘史》的检查，说：“我在管理《人民日报》工作期间，曾经多次抗拒毛主席的指示。1950年，毛主席指出，美化八国联军、光绪皇帝而污蔑义和团运动的卖国主义影片《清宫秘史》应当批判。……但是我在事前接受了……刘少奇说它是爱国主义影片的反动观点，不让批判这部电影。”确实没看到胡乔木作古前否定这个检查。——笔者）放的电影有些镜头剪去了。你看电影剧本这点很清楚。八国联军进北京，珍妃跟光绪说，不要走，留下来，要依靠洋人跟（慈禧）他们斗。主席说，这就不对了，这就是卖国主义。对我写的这篇文章主席一方面说“写得很好”，一方面又亲自做了修改，还亲自加写了极其重要的一段：“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、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，去‘杀人放火’呢？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、压迫剥削中国人民，因而激起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、贪官污吏？这是大是大非问题，不可以不辩论清楚。”主席为了表示支持当时的红卫兵，把红卫兵和义和团中的“红灯照”相比照，他要我加强对义和团中“红灯照”的叙述和描写，他在我的送审稿上批示：“红灯照，又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，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，练习武术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，似可在这里增加几句。”这个问题，我遵照主席的批示照做了。我在文章中连历史上一个人名字写错（按：即把“赵舒翘”误写做“赵舒饶”），主席都提出来了。（参见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》第12册第292-293页）

不仅如此，总理主持召开几次政治局会议，对我这篇文章逐句讨论修改。文章点不点名，点谁的名，怎样点，那都是讨论过的。对刘少奇没直接点名，“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就是指他。江青极力主张点邓小平的名，我根据大家的意见，用“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指代。陆定一在“彭、陆、罗、杨案”中早点名了。在这篇文章中明确点周扬的名，那是江

青的意见。陈伯达要点胡乔木的名，我不同意，康生也不同意，陈伯达坚持，双方妥协，用了“胡xx”，这叫半点名。如果不是中央的意思，或某个大人物的主张，点这些人的名，我能这样做吗？我敢这样做吗？关于文章署名问题也进行过讨论。我希望以《红旗》杂志社论或编辑部文章的名义，总理说，在外国社论或编辑部一类文章，要比个人署名文章层次高，我们搞批判的第一篇文章还是个人署名好，大家都同意；我又提出是不是用个笔名，江青瞥了我一眼，我觉得她认为我有害怕的意思，别人没说什么，我也就收回了这个意见，——因为文章是我写的，署名当然是我。这样一来关于这篇文章的一切恩怨和仇恨也都集中到我身上了。再说一点，在这篇文章中向“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提的八个问题，是在林杰提出的几个问题的基础上加以增加、扩大而成的。说实在话，这篇文章虽然是我写的，但这并不是个人行为，主席看过和修改过，还经过总理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讨论过。如果能查档案的话可以看到总理在这篇文章上留下的笔迹。我这样说，绝不是想推脱责任，而是说明实际情况。到现在为止，我对写这篇文章，当然有经验教训需要总结和汲取，但我并不后悔，当时我是积极地自觉自愿地做的，主席修改我的文章，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我的文章，我都感到光荣和高兴。在这篇文章中我说《清宫秘史》的作者姚克是“反动文人”，这是不对的，他还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的。

阎：是否请你谈谈成立“大批判组”搞大批判的情况？

戚：为了从思想和理论上批判和清算修正主义错误，在1966年秋冬从《红旗》杂志调了编辑杨永志，从解放军调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廖初江、王道明等成立了一个理论组，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集刘少奇一生所有的文章、报告、讲话等，编《刘少奇言论集》，以供批判用。其“成果”，就是他们先编了八卷本的《刘少奇言论集》，后来又选编了两卷本的《刘少奇言论选》，印数很少，大概只有二、三十套，发给毛主席、林彪、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。1967年初毛主席提出秀才们应该写些批判文章的任务后，根据陈伯达、江青的指示于1967年夏天又成立了一个“大批判组”，成立大会是在沙滩大院的教育楼召开的，到会的有大、中学校和北京各界、各个单位的代表，整个教育楼几百人的位置都坐满了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有陈伯达、关锋、我，有没有王力、张春桥、姚文元记不清了，成员有10人，具体是：杨永志、廖初江（？）、xxx、xxx，你不也是成员之一吗？在这次会上讲话的有陈伯达、关锋和我。内容主要是要开展对刘少奇的大批判。

阎：对，我是成员之一。我因为担任江青的秘书事太多，“大批判组”的事我基本没管。具体负责组织工作的是杨永志，办公室仿佛设在北京师范大学。记得就是在这次成立“大批判组”的会议上，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出对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要简化，并说是不是称“走资派”？从此“走资派”的概念和叫法逐渐而迅速地在报刊和社会上传播开来，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”简化语。“大批判组”成立后写的第一篇文好像是1967年8月15日以《红旗》杂志编辑部、《人民日报》编辑部发表的《走社会主义道路，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？》，对这篇文章毛主席在8月11日有两段批示（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》第12册第397页）：

此文写得较好。但有几处只有谴责，没有印证，不足以服人，请再加考虑。

毛泽东

十一日下午五时

退陈伯达、江青照办。

毛泽东
八月十一日

“大批判组”还组织和写了什么文章没印象了。

值得说一说的，在“大批判组”成立会议后江青叫我写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。她对我说：“你能写文章，你也写一篇批判文章嘛。”我说：“没时间。”江青有点不高兴地说：“抽时间嘛！”如果不是江青布置我写，当时我是不能写，也不敢写的。说心里话，江青既然叫我写，我也想写一篇叫江青看看。这有点表达自己的意思。我找了刘少奇一篇有关于“和平民主新阶段”内容的文章来批。你还记得不，大概是王力、关锋被隔离审查的第二天，——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出事，我问你：我的文章是否送关锋、林杰看看，提提意见？你很坚决地说：不要了！你也没说原因，我也没问你。王力、关锋被隔离审查，我是在事后五、六天才知道的。到1967年11月份，江青叫我把文章请陈伯达、姚文元修改后给《解放军报》发表——当时江青的女儿李讷正负责《解放军报》的工作。当我把文章送给陈伯达时，他说不看了。姚文元对我这篇文章做了认真的修改，他把文章题目《资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》改成了《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战略和策略》，加了一个“反”字，其批判力度就大大加强了，此文在1967年11月17日《解放军报》上发表。江青要我把我这篇文章给《解放军报》发表，李讷当然满意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见了，也一再表示感谢我对军报的支持。

老戚，另外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我在一本书上看到，说刘少奇没整过什么人，是这样吗？

戚：不是，不是！华岗不是他整的吗？华岗的儿子华贻芳，是我的同学，他生前跟我说，他原来对刘少奇是很崇敬的，看到刘整他父亲华岗的材料，就再也崇敬不起来了。刘整的人恐怕不止华岗一个人。可以想想看，我们的领导人谁没整过人？据说，陆定一就说过，他领导的中央宣传部就是整人，今天整这个，明天整那个，到头来自己也被整了。客观地说，大概朱老总没整过什么人。

二、关于王关戚事件

戚：王力、关锋出事后，检查我不能不写，因为我和他们关系比较好，特别是和关锋（阎插话：记得当时你跟我说过：“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”。），这点，人们，特别是造反派红卫兵都知道。当时我在造反派红卫兵面前说话比王力、关锋说话管用（阎插话：文革后，我跟关锋议论，我说“从你们三个人当时的作用看，好像不是王、关、戚，而是戚、关、王。”关锋不同意这种说法，不知为什么他后来变了，跟采访他的人也这样说。）。1967年9月7日主席对我的信即我的检查做了批示（见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》第12册第412页）。批示内容是：

已阅，退戚本禹同志。

犯些错误有益，可以引起深思，改正错误。便时，请告知关、王二同志。

毛泽东
九月七日

此信和批示江青阅后，是你告诉我，江青要我向王力、关锋传达，我马上到钓鱼台二号楼向他们传达了。从主席的批示看，这本来是当作内部矛盾，不知为什么到1968年1月份又变成了“抓”？这变，肯定也是主席变的，但究竟为什

么，仿佛还没人说过。现在的书和文章讲到王关戚问题，都是根据《微行》（按：指权延赤所著讲述杨成武 1967 年 7-8 月随侍毛泽东到武汉、上海的一本书），那本书很多胡说八道。关于这件事情该书所写，和杨成武当时跟我说的完全不一样。杨成武从武汉回来报告总理、江青后，就到我这里跟我说，他在主席面前说了我许多好话，我还向他表示感谢。他说，主席要我参与处理王力、关锋的事情。实际上，很多事情也确实是我处理的。比如，把王力、关锋隔离在钓鱼台二号楼就是我把他们送去的。我把他们送到二号楼后，跟警卫战士说，他们还是首长，你们要好好对待他们。我回到十六楼会议室汇报了这件事情，谁都没说什么，后来总理走了，江青大哭一场。文革后我跟关锋说到这件事，关锋相信江青哭是真的，所以关锋对江青始终没有什么反感。在王力、关锋被隔离后，他们提出什么要求，办事组的人也都是请示我怎么办或怎么答复。说实话，王关戚事件到现在还是一个没说清楚的谜。你能说清楚吗？

阎：你都不说清楚，我怎么能说得清楚？我只能根据一些材料研究，做些分析。我认为，王关戚是“抛”出来的，不是“揪”出来的。

戚：对。而康生、陈伯达等不这样看。他们把王力、关锋说成江青“端出来的”，即说成江青的功劳，这不对，对隔离审查王力、关锋，江青的心情是很沉重的。康生、陈伯达以及姚文元等这样说恐怕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。

阎：主席为什么把你们抛出来？是不是为了安抚和稳定军队？你们三个人都是为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的。抛出你们三人对毛主席来说恐怕也是“挥泪斩马谕”吧。

戚：主席抛出我们三人，特别是王、关，确实是为了安抚和稳定军队。武汉“七二零事件”后，军队很乱，全国到处游行示威，冲击军事机关，喊“打倒陈再道式的人物！”“打倒 xx 地区的陈再道！”等等，报纸上也是铺天盖地这样的报道和宣传，主席肯定认为这样下去不行，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；而要解决，就要找人负责，也就是找人当“替罪羊”，这就找到王力、关锋了，因为他们借“七二零事件”宣传“揪军内一小撮”，造成全军的混乱，他们要负责。

顺便有一个问题我告诉你，王力在他的《反思录》中说，主席经常单独接见他，这是瞎吹；说他经常在主席面前说邓小平的好话，这是为了讨好邓小平，——实际上，他批判邓小平是很早的，并积极地写材料。“邓矮子”就是他说的。邓小平原来准备用王力，和关锋处理不同，后来为什么不用了，这里面肯定有原因——仅说陈云反对恐怕还不行。王力给中央递了很多建议书，据说后来邓连看都不看了，原件退给他。这是不是有人向邓反映了王力说“邓矮子”的事情？对这个说法邓是很敏感和反感的；文革前，我就知道这点。王力还说什么，陶铸成为党内四号人物是主席根据江青意见定的，这是瞎说；实际上，政治局常委的人选和排位次序都是主席和总理商量定的。说实话，主席在“文革”前一直到他发动“文革”的时候，组织部门都被刘少奇掌握了，当时刘说话，比主席还管用，我在办公厅工作有亲身体会。凡是刘少奇批的文件，那要马上办，而有的主席批的，就可以放一放。为什么？因为刘掌握组织部，省委书记的任命，组织部说了算，主席是不管具体的。但军队是主席掌握的。军队不能乱，这是主席的一条重要的或者说根本的原则。抛出“王关戚”，后来又搞了“杨余傅”，这也是一个平衡。杨成武这个人很张扬，树敌也比较多，主席和林彪都不怎么喜欢他。

阎：你为什么被“抓”？

戚：说不清。大概你送错那封信，是你被抓的导火线，也是我被抓的导火线。

阎：是吗？我第一次听你这样说。

戚：一点也不错。那封信你没看清，没看懂。那个写信的女演员，原来不是叫“江青”，而是叫“江菁”，即带“草”字头的。这个字不念“qing”，而念“jing”。这个女演员是参加过“军统”的。江青生气、发火恐怕也在这一点。

阎：哎呀，这些我都不知道，不记得了。那封信很长，我由于不断地接电话和收发文件，不是一次看完的，我对这封信的内容误会了。

戚：这封信，当时江青叫我看了。这封信你不该送给她，你送给她以前应叫我看，我是你的领导嘛！当然，我说这封信是导火线，肯定也不是仅仅因为这封信就抓我，大概江青已经对我积累了很多不满。而这不满是什么？我说不清。

阎：不满就抓人啊？这是什么法律？

戚：当时“砸烂公检法”，已经没有法律了，江青等领导人说一声就可以抓人。

阎：像你这样“大人物”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，江青说一声，就能抓吗？

戚：一定还要经过主席。主席为什么批准抓我，我想不清楚，说不清楚。

三、关于江青和总理的关系

阎：现在很多书（包括王力的书）在谈到江青和总理的关系时都说，“文革”一开始江青就把总理视为“眼中钉”，“要打倒总理”，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对，不符合实际。我看到的情况是，总理和江青的关系不错。总理经常去看江青，在去前，总理常给我打电话，问江青同志现在在做什么，我要到她那里去。当我向江青报告时，我没发现和遇到一次江青不让总理来，或找个什么借口不让总理来，在1967年一年的时间里都是这样。就在1967年2月“大闹怀仁堂”前后，我拿一份关于总理的什么材料（可能是关于总理的大字报）给江青看，江青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。”江青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，也很直接。

戚：在这个问题上，你批驳王力很好，王力的回忆录有很多不符合事实的地方。你说得对，江青和总理的关系确实很好，这与江青和其他领导人的关系不同。江青敢在总理面前发脾气，耍态度，这正是他们关系好的一种表现，她怎么不敢在其他中央负责人，如刘少奇、林彪等面前这样做？总理总是像哄小孩一样哄着江青。不错，在会上，江青经常说“总理，你总是今天保这个，明天保那个”，这是意见和看法不同，并不是要打倒总理。江青怎么要打倒总理呢？难道她不知道没有总理的支持毛主席就不能打倒刘少奇？在打倒刘少奇问题上，总理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。组织方面刘少奇是掌握了，在军队方面，在政府方面，他没掌握；在政府方面，总理威信很高，绝大部分干部（包括高级干部、中级干部和一般干部）都听他的。在文革中，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那是下了决心的，他所以能这样做，敢这样做，其重要和根本原因，就是他争取和得到了林彪和总理的支持。这是了解文革非常重要的一点。

有人说我反总理，这完全是编造。总理一直对我很好，曾赞扬我是“青年历史学家”，要向我学习，还说我办事有能力，我一次患感冒时，总理一晚上三次打电话慰问和询问，如此等等。我要反总理还有良心吗？这是个做人的根本态度问题。

我认为，总理在“文革”中态度很好，姿态很高。当时主席和中央文革都不允许给总理贴大字报，有人贴了（特别是贴到天安门的），中央文革就组织人把它覆盖起来。总理总说，叫他贴嘛，覆盖它干什么，我不怕，我打不倒；如果是坏人，也让他暴露嘛！贴主席的大字报不行，贴林副主席大字报不行，如果连贴

我的大字报也不行，那我们还叫什么民主？贴我大字报的人不要抓，抓了的，要放出来。本禹同志，你告诉谢富治同志注意这个问题。

阎：你讲这些，我觉得符合事实。我还被你们派去找聂元梓、蒯大富，让他们组织人到天安门覆盖关于总理的大字报。关于总理姿态高的问题，我记得你当时就跟我说过；你说康生、陈伯达等有谁给贴了大字报就紧张得了不得，总理很坦然。

戚：听说后来“批林批孔批周公”就是批总理，那我就知道了。

四、关于林彪事件

阎：我看你和林豆豆接触频繁，交谈甚洽，她对她父亲和主席的关系怎么看？

戚：她要为父亲翻案，当然对主席不满。但她很有气质和风度，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，不随波逐流，我很赞赏她这点。

你说林彪是“反革命”吗？当然，他如果真地要暗杀毛主席那无疑是反革命了。但这有什么确实的根据？林立果搞那些东西都是小孩玩意，林彪知道吗？有个被称作林彪或林立果亲信的名叫做李伟信的人，他在林彪事件后，几乎没受到什么处罚，现在他在上海做买卖赚了很多钱，国内国外到处去，很出风头。这很蹊跷，他和林彪、林立果到底什么关系？

阎：说林彪是“反革命”，我觉得没充分根据。我认为，说林彪是“反革命集团”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。我很注意这个用法的变化。我看2003年出版的《毛泽东传》没有“林彪反革命集团”的说法，只用了“林彪集团”的说法，我跟别人说其“定性”是不是有什么变化？可是后来我看到这两个说法都时有出现。所以上次见到豆豆时，她对《华国锋同志生平》中没用“反革命集团”的说法很满意。我跟她说，在11月份举行的纪念刘少奇诞辰110周年的讲话中还是用了“反革命集团”的说法。好像在这个问题上上面还没有一个确定不变的意见。对林彪的宣传目前似有所松动。而关于林彪问题在学界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的。

戚：我听林彪的一个秘书讲，林彪外逃，不是主动，而是被动的。

阎：这正是豆豆的观点。她认为她父亲外逃是被她妈妈和弟弟挟持、胁迫的。说实在话，林彪走上这一步，与主席处理不当也有关系。学界有种说法，“九一三”事件是毛主席“逼”出来的。关锋也说，1971年8-9月，毛主席到南方一路上到处讲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，讲军队的问题，说这个问题还没完，说陈伯达还有后台，这些话林彪能够听不到吗？能够容忍得了吗？

戚：主席在1971年8-9月的做法确有不妥的地方。刚刚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，怎么又这样呢？主席在南方的谈话是谁向林彪报告的呢？

阎：这个问题我说不清楚，我对这个问题没怎么研究过。林彪事件或者说“九一三”事件，对毛主席刺激很大，大病一场，几乎从此一蹶不振。在“七二零”事件后，毛主席曾引古诗“时来天地皆同力，运去英雄不自由”，来反映自己的心态，我看这两句诗不仅是他“七二零”事件后的心态写照，也是他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的心态写照。据整理过毛泽东图书的中直老干部局管理局副局长徐中远说，毛主席文革中在他看过的书上反复抄写这两句古诗。这恐怕不是无意识的吧？！在“九一三”事件后，主席是这样，江青又怎样呢？据江青身边工作人员说：江青夜里经常做恶梦，什么林彪、叶群向他索命，等等，吓得她睡不着觉。第二天，她把这个梦告诉工作人员，工作人员向她解释说，梦都是虚的；她也说，我是唯物主义者，不相信这个，等等。这是否也反映一种心态？也可说明一点问题？江青直到1971年9月12日，即“九一三”事件的前半天，她还公开夸耀林

彪送给她的几个西瓜，在游览颐和园时，切西瓜给工作人员吃，并表示衷心感谢林副主席的关心。

戚：难道江青一点也不知道林彪对主席不满和反对主席？这也是一个谜。还有“九一三”事件后，即获知林彪等人摔死温都尔汗后，总理大哭，不知为什么？

阎：对总理的哭有各种解释。确实值得玩味。

五、关于田家英的问题

阎：我在网上读过你的《田家英之死——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》，我还向别人推荐和介绍过你这篇文章。

戚：那篇文章我只讲了不到田家英问题的三分之一，关于田家英问题我还有很多话要说。

阎：重庆有个研究文革的人来信说，有个要写田家英传的人，说田生前曾说过“刘公为什么不造反？”问我有没有这回事？我告诉他，田家英恐怕还没到这种程度。“刘公”即刘少奇。至于田家英为什么自杀，我看主要原因可能有两条：一是毛主席不信任他了，他觉得没希望了；二是他在生活作风方面似不够检点，这在当时是很丢人的事情。当然，田家英自杀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毛主席不要他了。

戚：我认为你分析得对。田家英自杀的原因确实主要是这两条。主席为什么不信任他了呢？这主要是他和刘少奇的关系。毛主席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，田是主席办公厅的副主任，当主席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，而换上刘少奇时，田没有辞去主席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，而继续留任。他给刘少奇打电话，问他应怎样工作，刘说：你过去怎么做还怎么做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他经常到刘少奇那里去。他每次什么时间去，什么时间出来，都被刘宅的警卫战士记录下来——这当然是他们的工作职责。有时去的时间很长。汪东兴把这种记录报告或交给毛主席，毛主席看了一定不高兴，他会觉得或认为自己的秘书跑到别人那里去了。在所谓“三年困难时期”，田和刘少奇都主张“包产到户”，刘指示他把他们这种主张向毛主席报告。田家英把这种主张向主席报告后，主席问他这是你的意见，还是别人的意见。田说是他自己的意见。主席认为他说的不是实话。就这样一来二去，毛主席就逐渐不信任他了。江青说田家英是“一仆二主”，就是指这件事情。

田家英是很有才的，有思想，工作也做得好。说我在文革中迫害田家英，这完全是胡编。我从1950年到中南海就在他领导下工作，他对我很器重，很培养，在政治上也替我说话，人总要有良心，我怎么能反对他、迫害他呢？我倒是受到这样的批评：说我对他有温情主义。田家英有的亲属写文章也说我对田家英怎样怎样，我不怪他们，我相信他们终究会把事情的真相搞清楚的。

阎：不是说你参加了要田家英停止工作的谈话吗？其情况是怎样的？

戚：是，我参加了，我和王力是陪同当时的组织部长安子文一同和田家英谈话。1966年5月22日（即田家英自杀的前一天）我们三个人到田家英那里，安子文很平和地跟他说：“家英，你犯了错误，中央收到反映，现在决定即日起你停止工作，进行检讨。你的工作、文件，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，都交给戚本禹，等一会就办交接手续。”还说：“你的问题多大，怎样处理，要根据调查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。你要相信中央，相信主席。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，不要出去了。”我和王力都没说什么话。在那样场合和情况下我们也不会说什么。坊间一些书籍，说什么安子文谈话就像训人，气势汹汹，这完全是瞎编。

阎：听你这样一说，我对田家英的问题有了进一步了解。我从中央办公厅和

中央政研室的不少人那里也听到关于田家英的一些情况，是零零星星的，不连贯，不系统。你今天谈的，帮我总结和概括起来了。

戚：在田家英问题上，我对有些人很鄙视，很看不起。他们在揭发田家英时，捕风捉影，任意夸大，无限上纲上线，材料写了一大摞，把他简直说成魔鬼，后来写文章、写书，又把他吹得白玉无瑕，圣人一般。我认为，田家英既不是圣人，也不是芸芸众生的普通人，是一个有缺点有错误又很有思想有能力的才子，是党内一个很难得的高级干部。他的自杀不是什么自绝于人民，什么叛党，而是很可惜的。田家英是我的老师，有恩于我，有情于我，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。

后来我确实代替田家英负责中办秘书室的工作，主要为毛主席服务。我担任这个工作之后，江青有一次和我谈话，郑重地告诫我：“……在主席身边工作最忌讳‘结交诸侯’，这‘诸侯’既包括中央的，也包括地方的。”我觉得田家英栽就栽在这个问题上。不能“结交诸侯”，这恐怕也是一切做秘书工作的人最重要的一条戒律。

阎：你说的对，我给江青做秘书时，她第一次谈话的内容，现在看来也含有这个意思。她说：“……从今以后，你就在我这里工作，除了我之外，你不能再接受其他任何人布置的工作和任务，也就是说，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再向你布置什么工作和任务，这是党的纪律，你要对党负责，对我负责……”若问这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只能说这是一种政治——一种我们一般人还不怎么了解和懂得的政治。

2008年12月于北京沙滩敬学轩